

青未了



书坊周刊·特辑

享受不能无止境

自从清朝的一些人和事被编成故事，搬上银幕和荧屏以来，有几个鲜活的人物，逐渐被观众所熟悉。其中一个叫和珅的大臣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。加上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，历史离现代人近了许多，北京城内有许多当时的建筑又保存得完好无损，使现代人能更多地了解历史留下的物证。和珅建造的“银銮殿”，便成了旅游参观者当选之地。所以，和珅的传说，有了这座“银銮殿”，一切都变得真实可信。

据史书记载，和珅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物，他不仅长得像模像样，还有着一肚子墨水，经常在皇帝面前卖弄文采，且能出口成章，旁征博引，博得了皇帝的赏识。他不仅文采出众，溜须拍马、察言观色的本事也堪称一流。所以，他要模样的模样的，要文才有文才，要玲珑有玲珑。可以说，在封建官场上，官员该有的和珅已全部具备，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，因而他的官位不停地往上升，一直升到皇帝身边，成了朝中要员，皇帝的重臣。作为封建时代的读书人，能走到这一步，已经是登顶了，和珅应当知足了。当时的满朝文臣中，才学超过和珅的人，不是一批人，像纪晓岚、刘墉这样重量级的能人，论学识都比和珅胜一筹，但他们在阿谀逢迎、溜须拍马方面，却大大不如和珅，再加上和珅又是地道的满族人，同皇帝又能绕上族源，得到皇帝的重用也在情理之中。可

人和珅，从来不与那些与自己地位相当或低下的人相比较，他两只眼睛只盯着皇帝，真可谓眼球围着龙体转，屁股就开始惦记龙椅了。他胆子越来越大，竟然要与皇帝比肩，虽然没有奢望坐在龙椅上当皇帝（至于他的思想深处到底想没想，他没有自述，我也没去找这方面的资料），但从当时的翅膀硬度来看，还不具备做皇帝梦的条件。可这个和珅说他聪明，他确实有过人之处。既然要与皇帝比肩，龙椅不会有两把，但通过皇帝的生活，享受皇帝般的物质待遇，与当上皇帝没有多大差别。或许和珅认为，人生不就是享受吗？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快乐一时是一时，和珅似乎悟透了人生真谛。于是，坐轿超规定，住房超规定，纳妾超规定。只要他的事，都要来个“破格”。因为他要享受的是皇帝的标准，超出清政府的规定是很正常的事。不超出，怎么能叫皇帝待遇，不超出又怎么能区别于众官僚。和珅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，不怕别人揭发，不怕别人告御状，主要是看准了他与皇帝的关系，只要皇帝不知底细，或者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，用不着提心吊胆。和珅就这样，明目张胆地过着皇帝一样的生活。皇帝住在金銮殿，他就要仿照金銮殿建造一座“银銮殿”，你看和珅是多么地有创造性！“银銮殿”的建成，确确实实填补了中国封建时代官吏所住府邸的空白，和珅确

实太有才了。但和珅没有想到的是，公款消费，那都是有规定的，花国家的钱可不能大手大脚，尤其是在为自己建安乐窝时，更要按规定办事，不能假公济私，也不能以权谋私。超标准建房，就是缴纳房租也是违规，如果变成个人财产，那应当在犯罪之列。不是有人说，房子再大，自己只能用一张床。“银銮殿”虽然壮观，和珅也只能用一张床。至多让和珅看看此建筑，捋着胡须，恣意悠那么一刹那，舍此，还有什么呢！

和珅没有想到的是，人也有个自然规律，生老病死，那是谁也难以抗衡的。老皇帝乾隆死了，和珅的后台也轰然倒塌。这样，身居高位、颐指气使的和珅，罄竹难书的劣迹想掩盖也掩盖不住了。当年一些看不惯和珅的官员站出来了，用清王朝对官员生活待遇的规定来衡量和珅的所作所为，用和珅的欺世盗名、滥用职权来讨伐和珅的罪责，和珅超级别的享受，引来了祸水，他已经处在引颈受戮的境地。这时的和珅，讲颜面没人看，讲才能没人听，讲宗族关系更没人理会。看来，人一旦做了违规违法的事，一旦这些事败露或被揭穿，原先的一切优势，诸如权利啊、关系网啊，甚至亲情啊，都变得软弱无力。权利可以免除，关系网那就更靠不住了，在那个“有奶便是娘”的时代，关系网顷刻间便会网破，网上的人也会根据情节轻重，或绳之以法，或降职使用，或削职为

民。这时的关系网正好为正义力量网尽邪恶创造了条件，要不怎么叫一网打尽呢？和珅终于没有逃出法网，他与皇帝比享受的结果，是家被抄，金银财宝和那“银銮殿”被朝廷没收，和珅被皇帝赐死，甚嚣尘上的和珅，落得个悲惨的下场。“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”，可谓至理名言。

聪明的和珅，朝廷中的风风雨雨他经历了很多很多，都被他那过人的招数和多端的诡计化险为夷。也就是说，对于意想不到的难题，他能应对自如，变被动为主动，而对于大家都明白的事，他也了如指掌，却都不放在心上，即使对朝廷的明文规定，只要不符合自己的胃口，他也不在乎，依然我行我素。规定就是标准，大有大的规定，小有小的标准。这样，社会才能有序，事业才能在一定的轨道上前行，不至于为所欲为，无所遵循。和珅却对这样常识性的东西不屑一顾，恣意妄为。他公然藐视朝廷的规定，住房超标，坐轿超标，纳妾超标，佣人超标。他这样明目张胆地凌驾于王法之上，跌跤那也是迟早的事。圣人孔子对违反鲁国规定的大臣，曾毫不留情地说：“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”看看两千多年前孔子对多了几个跳舞的人，都大发雷霆，因为此事发生在礼仪之邦，讲的就是规矩，八队人跳舞，只有周王这一最高级别才允许，其他臣僚只能按职务大小层层缩减。那个时代规定得都那么严格，可见，规矩对一个等级森严的

国家是多么重要。和珅是个读书人，孔子的话不仅读了，凭他的记忆力，应当是耳熟能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并不认真想一想。可能是过于陶醉自己的官位，过于陶醉于皇上对自己的好感，他也太自大了。或许，他看着超标准的住房顺眼，体验与皇帝一样的享受自在，他也太显摆了。须知，王法早已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了，只是时间来早与来迟。所以，为官者还是要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，按标准要求生活，切不要越过规定的线，一旦越过，查出那是迟早的事。即使暂时没人过问，住在超标准的大屋子里，恐怕也睡不踏实，乘坐超标准的交通工具，恐怕心里也是忐忑不安，如果提心吊胆地生活，那不如说是人生的一种折磨，这又何苦呢？正如老子所说：“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”

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和珅的结局正说明了这一点。推而广之，从古到今，大到一个朝廷，一个国家，小到一个州府，无不有“宠臣”的身影在晃来晃去。当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下风光无限的时候，却不知道已经站在了万丈深渊的边上，还陶醉于自己的得意。岂不知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主子手里，主子就是那悬崖边上的大树，这棵大树如果有一天连根拔起，那么最先粉身碎骨的就是背靠大树乘凉的人。这就是“宠臣”的命运走向。所以，为官者要牢记，规范有界限，越界线很危险；道德有底线，底线以内很安全。

管好身边人

从史书上看到，齐国相国晏子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工作人员，他的职责是给晏子驾车，史上没记载他的名字，只称他为车夫。能给齐国相国驾车，在这位车夫看来，是十分荣耀的工作，与其他车夫相比较，自己又不知高出多少倍。相国的车夫，因为服务的主子是高官，自我感觉似乎也飙升了。于是，他不是认真去对待工作，而是在努力表现自己。晏子没有发现车夫的异常，可车夫的妻子却深有感受。史书上没有这方面的详细材料，但略加分析，即可得知车夫肯定是在妻子面前有异样的表现，或说话的腔调有变化，或走路的姿势与过去不同。不然，他的妻子不会窥视他驾车时的神态。一次，车夫为晏子驾车，妻子躲在暗处观察车夫的一举一动，果然是傲气得很。只见他昂首挺胸，高高地坐在车上，头顶上还遮着大伞。这位车夫本来身材就高大，又这么装模作样，使那本来就矮小的相国晏子，显得更加矮小。似乎车里应该坐的不是相国，而是这位车夫。

车夫虽然处在极度的陶醉中，可

一般。陶醉的车夫被爱妻的一席话猛然惊醒过来，从此，他也找准了自己的位置，明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更懂得了如何做人处事了。

这位车夫，只是在为相国驾车的过程中突出了一下自己的高傲，虽然有点狐假虎威的表现，但还没有打着晏相国的旗号为自己或他人办私事。如果说这位车夫有异常的话，那只是刚刚处在萌芽状态便被爱妻发现，进行耐心说教，使车夫幡然醒悟。假如他妻子听之任之，或者是全力支持，车夫就有可能做出更多利己家的事来。如，打着晏子相国的旗号，将自己的亲戚朋友调进齐国有相关部门工作，或者为别人的升迁提供些帮助，或为强取豪夺的人打羸无理的官司，或在齐都城内的黄金地段开个店铺，经营“齐纨鲁缟”，诸如此类的事情车夫都没有去做，也没有来得及去做，便被妻子的良言制止住，不仅使他再没有不良表现，反而使他变得谦虚谨慎，所作所为都与车夫的角色一致。但是，这样的妻子，别说在两千年前难以找到，即使在现代社会

也是不多见的。

官多大奴多大，王府的奴才还是七品官。这是封建时代老百姓对那些在官员身边工作人员的看法。这不是说身在官位的主人有多么大的权力，而是说为官员服务的奴才，是多么的神气。在那个时代，高官身边的工作人员，一般都把自己视为主人的替身，主人的地位有多高，工作人员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到多高的位子上，说话处事，俨然就是个高官。久而久之，这一种人便成了官场滋生出的异类，他们往往打着为官者的旗号，责令下属办这办那，作为下属并不了解那要办的事情，是出自为官者之口，还是出自工作人员之口，不便问也不敢问，长此以往，这帮人便成了不能轻易怠慢的上司，人称“二把手”或“影子主人”。主人的形象逐渐被这些人败坏。为官者的形象越糟，威信越下降，这部分人的作用越大。因为，一批巴结为官者的下属渐渐都向这部分人靠拢。既然买官的买到了，违法的没事了，如此说来靠上他们，就等于进了官帽厂，任其挑

选；靠上他们就等于找到了保护伞，任其胡作非为。历史上不少朝代的朝政被宦官把持，致使天下大乱，最终造成国破家亡，就是因为皇上被身边工作人员毁坏了声誉，破坏了朝纲，使奸佞得宠，忠臣失势，危害可谓大矣！清朝慈禧太后身边的李莲英，就是典型的代表。遗憾的是，在那长达几千年的人治社会里，这部分人总有市场。而且，不管名称改得怎么动听，只要为官者身边需要工作人员，就有像车夫这样的人，更有像李莲英这样的人。

看来，如何使用这部分人，管好这部分人，是当权者不可忽视的大问题。但愿历史不再重演，但愿更多的工作人员的妻子能像车夫的妻子那样明白。

“身边人”，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为官者的政治命运。作为高官，必须时时警惕被自己的家人、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“打倒”、“绑架”。而要不被打倒，则需要做到：恋亲不为亲徇私，念旧不为旧谋利，攀亲不为亲撑腰。为官者对此应保持清醒。

画蛇添足之想

北魏时期，有个叫古弼的尚书令，因为他敢于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较真，后来的《资治通鉴》为他记下了光彩的一笔，称他是敢于向帝王提出批评意见的人，并记下了他的格言——“为国远虑，虽死何伤！”

仔细翻阅史料，主要的就是太武帝拓跋焘打猎的事。因在狩猎中，太武帝发现自己带的马匹不能适应狩猎的需要，于是给古弼发了指令，让他把能跑能奔的好马送到猎场。按常规，帝王的指令必须是百分之百地执行，不允许打半点折扣的，可这个古弼恰恰来了个软磨硬扛，不仅不挑精壮的马，反而“悉以弱者给之”，就是把那退役的弱马送给了拓跋焘。正在狩猎兴头上的太武帝，等候的是良骥，以扬威猎场，享受逐猎之乐，看到送来的驽马，怎能不暴跳如雷？古弼头颅上尖下圆，像毛笔的笔尖，太武帝给他取绰号叫“笔头”，生气时叫他“尖头奴”。当时，在气头上的太武帝大骂要“先斩此奴”。在皇帝即国家的封建时代，古弼的行为已构成了欺君之罪，实属“杀无赦”之列，而这个罪

完全是古弼自己有意违犯的。帝王的指令非常清楚，要的就是好马，难道古弼连好孬都不知道吗？他是明知故犯。因为那个时代，主要靠的是人力、马力，拥有了大量好马，意味着在军备竞赛中占据优势。马力既是经济实力，又是军事实力。打猎靠好马追逐猎物，打仗靠好马追杀敌人。古弼正是基于对马的作用的认识，才敢于同“一把手”对着干。所以，当拓跋焘的“雷语”从狩猎场上传回来时，古弼身边的人都吓破了胆，唯有古弼泰然自若。他对下属的官员说：“我为人臣，不让皇上迷惑游猎，如果有罪过的话，我想这个罪也是我的；如果朝廷不能做到有备无患，使国家缺乏国防所需，这个罪才是大的。现在北边有强敌骚扰我国边境，我想把肥壮的马留给军队使用，挑选老弱的瘦马给皇上打猎，这是为国家安危而深谋远虑。即使为此死了，又有何妨？再说，这件事是我一人决定的，责任在我，要死也是我去死，大家用不着忧虑了。”已经把自己为何违抗太武帝的指令，说得清清楚楚。

正像史书所称道的，古弼不怕得罪皇帝，他在“为国远虑”。可我觉得古弼过于陶醉于自己的美好愿望，似乎在北魏，只有他古弼才是真正心系国家利益着想。我觉得这倒是古弼借机为自己自编自导了一幕“秀”剧。拓跋焘作为皇帝，是北魏的一把手，又是历史上出类拔萃的帝王，有勇有谋，治国有方。古弼作为尚书令，整天在皇帝身边工作，对皇帝的能力、人品了解得最多，知道得也最多。况且拓跋焘并非玩物丧志之人，北魏版图的扩大和政权的巩固，在位二十九年的拓跋焘起了决定作用，可称得上是一位励精图治的明主。古弼所处的这个时期，正是北魏最为强盛的时期。如果不是古弼有意作秀，即使把最好的马送给拓跋焘狩猎，也不会影响到军备。狩猎能用几匹马？狩猎又能狩几天？不用说北魏那时的势力强大，就是处于一般的国力，皇帝用几匹马狩猎也用不着如此小题大做。打完猎后，马不是照常用来保家卫国吗？正是因为古弼要借太武帝调换好马指令的机会，自编自导以瘦马代壮

马的“作秀”之剧，才能使他说出那样让皇帝和史上文人感动的“道白”来。试想，如果不利用这样的机会，古弼到哪里去述说自己的衷肠呢？拓跋焘被蒙了，史书的撰稿人也被他蒙了。拓跋焘最终不仅没有怪罪古弼，还对其言行大加赞赏道：“有臣如此，国之宝也！”随即“赐衣一袭，马二匹，鹿十头”。看看古弼这个“秀”作得是多么有价值。

如果说古弼有意作秀是冤屈了他，那么，我们不妨再晒一晒他的忠心。按他的说法，他是在“为国远虑”，而拓跋焘执政的那个时代，最值得远虑的并不是边境的安危，而是世家大族势力在中原占据统治地位。他们在地方上有着特殊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，形成了所谓的宗主豪强，与北魏政权相抗衡。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拓跋焘去世，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，才引起朝廷的重视。如果古弼真正有远虑，为什么不在这方面为太武帝出点好主意，况且这些宗主豪强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，又恰恰出在这个时期。当然了，我们无法苛求古人，但我

们也不能被历史上这些善于作秀的官僚们所蒙蔽。写到这里，此事似乎是拓跋焘与古弼两人在演“双簧”，作为一世英明的拓跋焘，不可能看不出古弼是在“作秀”。但恰如燕昭王重金买千里马枯骨的故事一样，拓跋焘嘉奖古弼的意图，其中大有深意：招贤纳谏，非令主而何？古弼作秀是小小“秀”，而让拓跋焘借机作了一把大“秀”。为国远虑的人首先应当是一国之君，国君没有远虑，那国必有近忧。作为国之臣子，应当做好的是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而不是两眼只盯着帝王的一言一行。这或许就是古人的思维定势，似乎只有从皇帝那里找点缘由，才能引起史官的注意，从而与青史结缘，留下美名。古弼在这方面称得上有识之士。怪不得史学家们把古弼捧上了天，说他敢于与皇帝较真，那是需要有不怕牺牲的勇气和胆略的。

由此不得不问：千秋功过该由谁来评说？是史官还是众多后来人？这正是自古至今的一个难题，一个无休止地争来论去的话题。